

“好学近乎知”出自《中庸》，在《孔子家语》中写作“好学近于智”，突出了好学的重要性。《学记》言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”孔子也曾感慨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纵观历史，凡是学有成就的智者圣贤都非他人所强迫，而是依靠自主自愿的好学精神。

学以修身力行

在孔门弟子中，曾子为人树立了一个“好学近乎知”的榜样。孔子称曾子生性鲁钝，但因其好学终成儒门“宗圣”。在《曾子》中，记载了曾子好学的心得：“君子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可谓学矣。”君子能够责备自己的过恶，寻求自己的过失，对自己还不会做或做得不完美的地方要加强，勉励自己做得尽善尽美，并克除自己的私欲，凡事都要依照义的标准来进行。这些都做到了，才称得上是学。

“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以行，难者弗避，易者弗从，唯义所在。”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。古代好学之人废寝忘食、挑灯夜战，甚至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，具有这样发奋读书的精神，才能够学有所成。此外，还要及时地把所学的付诸行动，在生活中去落实。难做的不回避，容易的也不盲从，只考虑其是否符合道义。“日旦就业，夕而自省思，以歿其身，亦可谓守业矣。”白天攻治学业，到晚上就自我反省检查，坚持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一直坚持到老死，才可谓坚守学业。

曾子还提出，君子之学必须把握好五个方面：“君子既学之，患其不博也；既博之，患其不习也；既习之，患其不知也；既知之，患其不能行之；既能行之，患其不能以止也。君子之学，致此五者而已矣。”君子学了之后，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广博；学得



“好学近乎知”的丰富内涵

□ 刘余莉

广博之后，还担心不能时时温习；经常温习了，还担心并不真正知晓其中的义理；已经知晓其中的义理了，又担忧不能付诸行动；既能在生活中实行，又担心在行动上做不到谦让。由此可见，曾子好学的标准相当高，要求人不仅能够学以致用，而且还要有助于养成自己谦让的品行。

在《颜氏家训》中，有一段关于读书、求学目的的论述，值得现代知识分子警醒：“夫学者，所以求益耳。见人读数十卷书，便自高大，陵忽长者，轻慢同列，人疾之如仇敌，恶之如鸱枭。如此以学自损，不如无学也。古之学者为己，以补不足也；今之学者为人，但能说之也。古之学者为人，行道以利世也。今之学者为己，修身以求进也。夫学者犹种树也，春玩其华，秋登其实。”

这段话提醒人不能把“学儒”变成“搞儒学”，知与行合一。其意是说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求得长进，可是我见到有人读了十几卷书后，便自高自大，欺侮长者，轻视同辈，这样别人自然像对仇敌一样恨他，像对鸱枭那样讨厌他。这样求学，其实对自己并无益处，还不如不学。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，以弥补自身的

不足；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，只能夸夸其谈。古代求学的人，是为了利益他人，推行自己的主张，以造福于社会。就如孔子到处周游列国，推行自己的仁爱学说，目的并非为自己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学说，能够为国君所用，造福于社会、利益人群。现在求学之人是为了自身的需要，增长自己的才干，以求做官。求学就像种果树一样，春天可以赏玩它的花朵，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。讲论文章，好比赏玩春花；修身力行，才是秋天的果实。可见，真正的学问是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经典落实在生活之中，使自己的德行以及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能力有所提升，最基本的也要做到仁义礼智信，把人人伦关系处理好。

学之弗能弗措

《中庸》对好学的特征与结果进行了阐述：“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。”人平时有不学的时候。虽然有不学的时候，但是无论如何要勉励自己，一有空闲的时候就要学，而且必须要学

得成功，所以说“学之弗能弗措也”。同样，人提问问题、思考研究、辨别事理、身体力行都要做到彻底。虽然人的能力、智慧、聪明不等，但只要肯学、好学都能有成就，所以不要自暴自弃；“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

孔子就是一位“学之弗能弗措也”的榜样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孔子去向师襄子学琴，学了十天，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。师襄子说：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。孔子说：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，但还没有掌握方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又说：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，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。但是孔子说：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境。又学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：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，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。孔子还是说：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。又学了一段时间，孔子神情俨然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时而庄重穆然，若有所思，时而怡然高望，志意深远。孔子说：我知道曲子的作者是谁了。那个人皮肤深黑，体形颀长，眼光明亮远大，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。若不是周文王，还有谁能撰作出这样的音乐曲子？师襄子听了之后，赶紧起身

再拜说：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曲子的确是《文王操》！

从孔子学音乐就可以看到，好学就要做到“学之弗能弗措也”，绝不可浅尝辄止，一知半解就放弃。

学习志在圣贤

读书志在圣贤，是古人求学的目标。因此，学不仅是学知识、学技能，重在学圣贤教诲。《大学》中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在儒家看来，智慧明德是人性本有，从未丢失，只是暂时被外物蒙蔽了而已，正是通过好学，可以去除外在的蒙蔽而开启自性明德，接近本自具足的智慧。孔子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夫子附近一定有忠信之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夫子好学，所以孔子能成为圣人。可见，孔子正是因好学而成就圣人。

孔子认为，人有生而知之者、学而知之者、困而学之者。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”，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，普通人都需要学，就连孔子也承认，他是学而知之者。《论语》中记载，孔子说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”。孔子一生好学，且自认为和

普通人不同之处，就是比别人好学。他好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以至于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。

“好古敏以求之”中的“古”，是指经典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的教诲，所以孔子所学所好都是圣贤之道。孔子自称一生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并没有认为自己有发明创作，自己所学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。现在人也很好学，知识面很广博，但如果所学的知识未必是经过历史检验而沉淀出来的智慧，又缺少道德的指引，就容易被误导。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学习圣贤经典就显得更加重要。

在《新书》中记载，“汤曰：‘学圣王之道者，譬其如日；静思而独居，譬其若火。夫舍学圣之道，而静居独思，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，而就火之光于室也。然可以小见，而不可以大知。是故明君而君子，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。’”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，可以把他比作是太阳；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，则如火光。如果舍弃了学习圣贤之道，而一个人冥思苦想，就像舍弃了门外太阳的光明，而去屋子里接近微弱的烛光。烛光可以让人有小小的见识，能够见到周围小的范围，但是开启不了人的大智慧。所以明智的君王、君子，都崇尚学习圣贤之道，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自冥思苦想。

可见，好学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对所学内容有所拣择，否则南辕北辙，越学反而离道越远。中国传统圣贤经典都秉持“学以致用”的原则，尤其值得求道的君子学习。人通过学习能够变化气质，成就圣贤品格，这就是《弟子规》中所说的“圣与贤，可驯致”。



曹刿与「长勺之战」

□ 李建永

鲁庄公九年秋天，鲁国讨伐齐国的“干时之战”刚刚大败；第二年春天，齐国的高偃、鲍叔牙、公子雍率领30万大军寻仇而来，开启历史上著名的“长勺之战”。

这个时候，曹刿登场。曹刿既非纯粹意义上的底层草民，否则就不可能轻易见到鲁国的国君鲁庄公；然曹刿亦非位列朝班的卿大夫者流，不然也不会被老哥们笑他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”。曹刿入见鲁庄公，开宗明义问道，何以战？鲁庄公扳着指头说出三个理由，前两个关于吃穿、祭祀的，都被曹刿以“小惠”“小信”给怼回去了，直到说出第三条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”，曹刿才说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”。

为什么审理案件“必以情”即“可以一战”？宋代朱熹注《论语》之“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”曰：“情，诚实也。”曹刿正是从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”这句话，把握到庄公政权在审理大大小小的案件时，能够忠于事实，体察人情，遵循法理，追求公正。孔子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”诚实与公正，是政治的核心价值，取信于民，民情可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治国也是治人情，打仗就是打精神。

“长勺之战”对于鲁国而言，是一场生死存亡的保家卫国战争。然而，相对于春秋时期的强齐，鲁国是个小国；相对于齐国的30万劲旅，鲁国的3万之师无疑是弱旅。这仗怎么个打法？但在曹刿看来，这仗有得打，最后也确实打胜了。战场上，骄横的齐军擂鼓冲锋，鲁军用强弓劲弩射击敌人，稳住己方阵脚；齐军再次擂鼓冲锋，鲁军依旧猛射敌人，站稳阵脚；当齐军第三次擂鼓准备冲锋之际，曹刿一声令下“可矣！”“万鼓雷殷地，千旗火生风”，鲁军突然间洪水般掩杀过去，打得齐军辙乱旗靡，望风而逃，兵败如山倒。3万人捧着30万人，打得对方溃不成军，“长勺之战”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。兵形如水，攻守易势，瞬息万变。用曹刿的话概括：“夫战，勇气也！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；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”“长勺之战”打的既是智谋与时机，也是民心与士气。

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鲁国在长勺（今山东莱芜东北）战役的大获全胜，间接地促成了齐鲁两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息兵言和。能战方能止战，敢战方可言和。这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所说的“战兵定功，止戈为武”，也是孔夫子所说的“有文事必有武备，有武事必有文备”。

曹刿在《左传》里出现过两次，一次是“长勺之战”，一次是曹刿谏鲁庄公“如齐观社”。据《左传》记述，曹刿并非“肉食者”列，而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载有“食肉之禄”，西晋杜预注：“食肉之禄，谓在朝廷治其职事，就官食者也。”唐代孔颖达疏：“在官治事，官皆给食，大夫以上，食乃有肉，故鲁人谓曹刿曰‘肉食者谋之’。”由此来看，曹刿在“长勺之战”前夕，最高属于“士”阶层。

曹刿并非达官显贵，但他在国家被迫面对战争的生死关头，能够当仁不让挺身而出。“晓战随金鼓，宵眠抱玉鞍”，在大敌当前兵凶战危之时，曹刿自告奋勇“战则请从”。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。”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，所谓国家者，是每一个人的国家。因此，曹刿不在其位，却主动去谋其政、谋其战，义不容辞、舍我其谁。但在“长勺之战”取得辉煌胜利之际，曹刿却急流勇退，安静地走开了。

人物志

火烹水煮都不怕的宋朝御史

□ 晏建怀

史书记载，北宋时期许多大官小吏、皇亲国戚，不敢轻易胡作非为，就因为朝中有一批御史，他们为人正直，立朝刚毅，以弹劾和纠察百官为己任，凡有不法或失德者，不管该人位置多高、权力多大，一律严加弹劾。仅宋仁宗一朝，就有三位这样的御史。

只会栽刺的包拯

包拯（999—1062年）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（今安徽合肥）人，进士出身，任过多年的监察御史、知谏院、御史中丞，是宋仁宗时期的御史，因刚正不阿、弹劾权幸而著名。

包拯所弹劾的最著名者即是张尧佐。张尧佐是宋仁宗赵祯宠妃张美人的堂伯父，张美人因出身不够显赫，希望通过张尧佐来壮大自己的门第，便屡次请求宋仁宗给张尧佐委以要职。张尧佐进士出身，在州县做官多年。按说，作为皇帝，要委重任于一个进士出身、履职多年的官员，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是，宋代有这么一个规矩：凡重要的人事任免，即便是皇帝推荐的，也必须在殿前同大臣们讨论，征得他们绝大多数同意方可任命。于是，在某日朝会上，宋仁宗抛出了张尧佐出任宣徽使的任命方案。经过一轮激烈的“廷论”，皇帝抛出的任命方案，竟然被一群朝臣给否决了。

第二年，宋仁宗旧事重提，再次抛出张尧佐的任命方案。谁知，皇帝刚抛出方案，任职谏院的包拯情绪激昂，言语激愤，大声说不可，而且说话时，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。最后，在包拯有理有据的言辞面前，这一提议只得作罢。

包拯最重官员操守，最恨以权谋私。宋仁宗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他出任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当时，三司使张方平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廉价套购某商人的住宅，



从中渔利。包拯认为，三司使是朝廷最高财政官员，非廉洁之士不能胜任，张方平巧取豪夺，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，因此，包拯上书弹劾张方平，致使张方平随即被罢。

“铁面御史”赵抃

赵抃（1008—1084年），浙江衢州人，进士出身，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右司谏、知成都等职，官至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。赵抃写过一首《康泉》诗：“岁早江潢万井污，此泉深净肯清渝。伯夷死后泉流在，能使贪人一饮无。”诗以言志，这表明，赵抃把打击贪官污吏、营造清廉作为自己的理想，立志要整肃宋朝的官场。

1054年，宰相陈执中府中发生侍女被打死的命案，一时京城内外舆论哗然。而且，当有人告状、审案官员要求宰相府的证人到场时，陈执中甚至软禁证人，使狱官无法对证，严重干扰司法。赵抃闻之拍案而起，立即以“违朝廷之法，立私门之威”的罪名弹劾陈执中，要求罢免其宰相职务。只是，

皇帝宋仁宗有意偏袒陈执中，非但没免去他的宰相职务，反而“诏罢狱”，替他开脱。1055年，铁了心的赵抃，又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，以“不学无术、错置颠倒、私仇嫌隙、家声狼藉”等八大罪状，连续12次上书，终于将陈执中拉下马，使他罢官去朝。

赵抃弹劾不避权幸，不但表现在对律法的捍卫上，而且表现在对官员形象、朝廷纲纪的维护上。三司使王拱辰出使辽国，作为外交使节，他却在参加辽国的招待宴会上荒诞不经，“痛饮深夜，席上联句，语同俳优”，既败坏了形象，又有伤国体。尽管宋仁宗特别喜爱王拱辰，但赵抃毫无畏惧，上书弹劾，一次不行，两次，两次不行，三次，连续上书，不依不饶，结果，王拱辰降职永兴军。此外，遭到赵抃轮番轰炸和大胆弹劾的，还包括枢密使王德用、翰林学士李淑、枢密副使陈升之等许多声名赫赫的高官，他们皆以罢官告终。

最后值得一提的是，赵抃不仅在朝廷任过要职，还任过多地大员。游宦官场40余年，两袖清风，即使是从油水富足的地方离任，也仅仅只有“一琴一鹤自随”。

“真御史”唐介

唐介（1010—1069年），字子方，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人，曾任监察御史里行、殿中侍御史。他最著名的事迹，就是弹劾宰相文彦博。

文彦博曾任枢密直学士、成都知州，后任枢密副使，又被重任为参知政事。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冬，贝州（今河北清河）王则起义，朝廷派枢密直学士、左谏议大夫明镐率军镇压，过了两三个月仍无进展，宋仁宗因贝州离京较近，深为忧虑。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正月，文彦博以参知政事兼河北宣抚使，挂帅去贝州平叛。不过，当文彦博赶到贝州之时，明镐已攻破贝州，平定了起义。捷书刚至，宋仁宗立即任命文彦博为宰相，明镐也提拔为参知政事。因此，时任监察御史的唐介便连连上章弹劾文彦博，说他在平定贝州战斗中抢了前帅明镐的功劳，才得以升迁宰相。

当时在朝堂之上，众目睽睽，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，这既是弹劾文彦博，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，让宋仁宗这位平日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愤。他推开唐介的奏折不看，威胁要贬唐介的官。唐介丝毫不胆怯，他说：火烹水煮我都不怕，还怕贬官？

这几乎是火上浇油，宋仁宗更加恼怒，赶紧把宰相、副宰相等几位股肱大臣叫到跟前，让他们传阅唐介的奏折，愤愤不已。此时，文彦博也在朝堂上，不远处的唐介竟然大声对文彦博说：彦博宜自省，既有之，不可隐。文彦博满脸通红，连连向皇帝请罪。

事后，文彦博还是被罢去了宰相职务。唐介虽然也被贬谪至英州（今广东英德市），但士大夫们对他却是一片赞扬之声。天章阁待制李师中、太常博士梅尧臣纷纷献诗，表达钦佩之情，尤其李师中一句“去国一身轻似叶，高名千古重于山”，给予他极高的评价，唐介因此获得了“真御史”的雅号。